

不止一次漂洋过海，也不止一次在海边听涛，可是，唯有这次在克罗地亚的扎达尔，才第一次听到了大海真正的歌唱。

克罗地亚地处亚得里亚海的东侧，与意大利隔海相望；北依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东邻波斯，南接塞黑。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却饱经战火离乱；它是历史上海上列强的必争之地，又是东方、西方、欧洲中部和地中海南部四大文化圈重叠、交汇、碰撞之处。自1991年独立后，其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兼以便宜的物价，吸引着各国游客纷至沓来，越来越展现出它迷人的魅力。

克罗地亚全国面积不足6万平方公里，却有着长达1778公里的海岸线，还串起了亚得里亚海岸1244座珍珠般的岛屿。8号高速公路几乎贴着海岸蜿蜒伸展，除了中间有极短的一小段被波黑隔断，需要另行通关以外，你尽可以伴着蓝天白云，碧波海浪，绿树青山，一路畅行；车少景美，无挂无碍，使你精神为之一爽，更何况这一路还能领略相当多的古迹遗存。

我们从北边的普拉出发。这里就有建于2000年前的圆形竞技场，是全世界仅存的最大的六个古罗马竞技场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在意大利境外的古罗马竞技场，名列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去时，恰夕阳西下，一对青年男女正在里面拍婚纱照，洁白的婚纱映衬着斑驳的残壁，勃发的青春化解了苍茫的岁月，堪称一景。

驱车南下，恰在8号公路的中段，就到了扎达尔。在它和首都萨格勒布之间，就是普利特维采湖国家公园，即著名的“欧洲九寨沟”十六湖，车程不到两小时，不能不去。十六湖，在

“倚声填词”，顾名思义，是在原有的曲谱上填写歌词。这一艺术性的创作手法，在我国早已盛行，唐宋时期从兴隆达到高峰。唐代的

李白、张志和、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以及南唐的李煜，宋代的柳永、苏轼、秦观、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等，都是“倚声填词”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熠熠生辉的作品，是中华灿烂文化的宝贵财富。

我在青少年时期，是不知道“倚声填词”这个概念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寺庙里开始有电视机，我偶然从电视机里看到征集为《长江之歌》《世界光曲》的旋律填写歌词的活动。这种通过电视媒体，向社会公开征集歌词，而且是“倚声填词”的歌词，在中国还是第一次（以后也没有过）。那时，我已是一个十来年创作经历的业余作者，面对过这一征集活动，却不知所措。几个月以后，活动揭晓，一个叫胡宏伟的年轻人技压群雄，一举夺冠。从此，这个小伙子黄声词坛，佳作不断。

胡宏伟是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的一名军旅作家，他的文艺创作始于诗歌，所以他的词作具有常用的音调和强烈的抒情成份。“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丰采；你向大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这诗情画意的歌词与优美动听的旋律，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征服了当时的评委，也征服了广大的歌迷。从那时开始，我关注起“倚声填词”的这一另类的创作手法。

在我国，李白等一批大诗人是中国古代“倚声填词”的高手。在现代，即从五四运动到今天，第一个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倚声填词”的高手，又是谁呢？我认为，应该是李叔同。李叔同1880年出生于天津一个盐商家庭，1905年东渡日本，主修绘画兼习钢琴和作曲理论。1911年回国，先后在上海东城女校和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14年冬，他的好友许经南失败，来李寓所向李叔同夫妇告别。在茫茫大雪中，李叔同默默向许挥手，内心感慨万千。回屋后，李叔同根据美国作曲家约翰·奥德威的歌曲《梦见家和母亲》，填写了他含泪写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是我儿时的记忆，它诞生至今已有一百年了，依然在广泛传唱，可见歌曲的魅力有多大。

在当今词坛上，张藜是颇有成就的“倚声填词”高手。张藜年轻时有过一段苦海的生活，80年代进入中央民族乐团，再度从事专业创作。由于他有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有与众不同的评议魅力和创作风格。

张藜的歌词影响很大，深受群众喜爱。他为《篱笆、女人、狗》等连续剧的主题歌和插曲，歌词形象，富有个性，别有韵味。因为他精通音乐，能准确把握音乐旋律和节奏，他的“倚声填词”能力，在圈内也是屈指可数的。由他填词的《我和我的祖国》（秦咏诚曲）、《亚洲雄风》（徐沛东曲），是当代填词作品的范例。他的歌词充满激情，富有思想，词曲乳文交融，天然巧合。张藜是一个奇才，他有诗意，有理论，有作品，他的作品别具一格，既能写词又能填词，词填得异常精彩。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好好总结和学习的。

平心而论，中国大陆能把握“倚声填词”的作者为数不多，而在港台两地却是极其普遍，他们依然保持着中国“倚

1979年就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比九寨沟更早；顾名思义，是由十六个高低错落的山地湖泊连缀而成，大大小小的瀑布奔泻飞溅而下，发出淙淙的水声，宛若鸟鸣和鸣。喀斯特地貌上曲折的栈道，绚丽的湖水，掩映的绿树，使之倍加赏心悦目；300年前地图上的“魔鬼花园”如今已成了人间仙境。这里比九寨沟少了许多人气息，也少了许多喧嚣，更能享受悠闲的心境。

再往南，就是斯普利特，是克罗地亚的第二大城。其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6世纪；它的老城中心和1700年前建造的戴克里先宫，都早已名列世界文化遗产。戴克里先是罗马帝国后期的改革家，是第一个正式称帝，也是后来唯一一个主动放弃权力退位的罗马皇帝，他退休后就曾居住于此，这里距他的出身地不远。戴克里先宫面朝大海，是按军事要塞的标准建造的，宫墙高达20米，正门的六根大理石巨柱，是远涉重洋从中东运来的。宫里的柱廊，戴克里先陵墓和朱庇特神庙至今都保存完好。巧得很，我们居然在此完整目睹了一次克罗地亚人的婚礼。男女老少，都是盛装出席；克罗地亚的女性本来就以美貌和身材好闻名，一穿上色彩缤纷的礼服，那真是花团锦簇，令人目不暇接；再加上小乐队的烘托，气氛非常热烈。厚重的历史并未成为负担，仍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

通过波黑的关口，这条高速路的南端即港口城市杜布罗夫尼克，意大利语称为拉古萨。在阅读地中海历史时，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这个名字，这是克罗地亚又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建于14—16世纪的杜布罗夫尼克古堡，城墙厚六米，高达二十余米，全长超过3公里；登上城墙，凭海临风，令人胸襟大舒。城墙外就是悬崖峭壁，居然还有不少胆大的年轻人在这里跳水。俯首城内，建筑十分壮美丰富。圣多明我修道院是哥特罗马式的；当年的主教官，如今的博物馆是哥特文艺复兴式的；以守护神弗拉霍命名的大教堂是巴洛克式的，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据说早在1929年，萧伯纳访问这座城市时就说过：“如果你想看到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去杜布罗夫尼克吧！”近年更因作为美剧《权力的游戏》拍摄地而声名大噪，如今这里也是游客最多的地方。

从杜布罗夫尼克回来，我们重返扎达尔。扎达尔也有许多古老的教堂，如9世纪前期的罗马风格建筑——圣多明斯教堂，建于12世纪的达尔马提亚海岸最大的圣阿纳斯塔西教堂等等，多达14座；但我们此行还有一个重要目标要实现，那就是领略闻名已久的扎达尔的海风琴。那天下午，我们早早来到了海边，那里有一片相当大的平台，然后是五六层宽宽的台阶，高低错落着一直延伸向海边。已经有不少人候在那里，他在台阶下落日无疑是世界上最美的景象之一。”估计都是信了希区柯克的这句话而前来欣赏落日。在最靠前的地方，有一排围栏标为拉古萨。在阅读地中海历史时，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这个名字，这是克罗地亚又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建于14—16世纪的杜布罗夫尼克古堡，城

墙厚六米，高达二十余米，全长超过3公里；登上城墙，凭海临风，令人胸襟大舒。城墙外就是悬崖峭壁，居然还有不少胆大的年轻人在这里跳水。俯首城内，建筑十分壮美丰富。圣多明我修道院是哥特罗马式的；当年的主教官，如今的博物馆是哥特文艺复兴式的；以守护神弗拉霍命名的大教堂是巴洛克式的，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据说早在1929年，萧伯纳访问这座城市时就说过：“如果你想看到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去杜布罗夫尼克吧！”近年更因作为美剧《权力的游戏》拍摄地而声名大噪，如今这里也是游客最多的地方。

与此同时，夕阳也在款款地踩着赧赧的金波前行。最后，在海天相拥处，就像一个羞红了脸的姑娘，扯起了一匹蓝色的缎子，手回眸一笑之际，遮住了自己的脸。

这就是扎达尔的海风琴。多少年以前，有一个孩子叫尼古拉·巴希奇，他常在扎达尔的海边游玩，与大海有说不完的话。长大以后，他成了一名艺术家、建筑师，要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2005年，就是他设计了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海风琴。他在台阶下埋下了35根总长70米的不同口径，不同角度的管道，构成不同的观阶。就在他坐的台阶边，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台阶下有着了一排排的气孔，每当海浪涌入管中，海风吹入音孔，在气压提升的压力下，就会发出类似管风琴的声音，悠然自得地鸣起来，看起来肯定是

收集、整理音乐史料，一般，只有专业工作者才会关心。近日在书店看到有一本《上海记忆——珍藏的音乐会节目单》（上海音乐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印数为1000册），编著者是原上海东方电视台音乐频道副主编、SMG音乐部总编室主任金建民（很可惜，三年前已逝世）。书中介绍了作者收藏的从1976至2005年整整30年时间里，上海各大演出场所、各家演出团体所举办的各类音乐会的节目单。小小的节目单里，透出了时代变化的缩影。我赞赏不已。旁观者也有不同看法的人不以为然：“这些过时的节目单收集起来，也竟然可以出书。”对历史文物的价值的认识不一致常常难免。这使我想起了另一本书也曾引起过争论。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由汪耀华编著的《“文革”时期上海图书出版总目（1966至1976年）》，把近万种图书的书目，按年代、类别进行编排。当年，正是这些出版物占领着我们的文化、教育、文艺生活，所造成的时代影响和后患是我们当前值得研究的问题。该书反映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上海出版的全部书籍的状况，恰恰具有难得的、填补空白且不可多得的价值性价值。

然而，对音乐史料的获取和考证，并非是一件事务性的工作，常常充满艰辛。日前，《音乐周报》庆祝创刊40周年时，刊登了两篇有关两首作品史料考证的文章，涉及方方面面，还原真相也有一定的难度。一是关于小泽征尔是否聆听《二泉映月》；作者介绍了他考证“小泽征尔是否聆听《二泉映月》”的过程和结果；二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创作过程亲历及当事人之一、公开了此曲创作过程的真相。两文都澄清了积累几十年的不实之词，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窃以为，本市好几位主流媒体，4月29日关于“上海之春闭幕式”事关《梁祝》活动的报道用词，强调了其创作及演出的团队，也许与之有一定的关系：“闭幕式上，作曲家何占豪、陈钢，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代表60年前《梁祝》首演创作及演出团队，上台领取由“上海之春”组委会特别颁发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六十周年特别荣誉奖。”往事可鉴。人们不仅在当下回顾过去，启迪前行的智慧，还生出更多担当，希冀今天的成果能荫泽后人。今人文实，不生着眼于“让历史告诉今天”，还不断希冀于后人察今；让今天书写的历史能告诉未来。未来是属于向前发展的人们！

岁月更替，人事代谢。越来越多的今天变成过去。而随着科技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社会的发展、变化也日益迅忽，前文中所述的实例，足以引起业界对艺术档案的重视了吧？当下，随着信息越来越庞大，良莠混杂，以讹传讹有之，常常一时真假难辨。而音乐史料事关人、事的有无、真伪、毁誉、存废，以供后人研究和总结、从历史中汲取走向未来的智慧。它们的收集、积累、整理、编写、保存等工作，要求从业者除了具有基本的写作能力外，还涉及到多种专业知识、技能和设备及技术手段，如档案学、中外音乐史（尤其是上海音乐史）、音乐欣赏、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计算机操作及多媒体制作等，工作相当繁重而困难；但值得为之努力和献身。然而，目前业界各有关单位领导对艺术档案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各单位的起步时间和基础工作、人员资源、技术手段参差不齐，亟需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资源共享等等。而且，各单位除了自身的业务外，涉及全市性的各项音乐活动的资料的收集需要团结、协作。因此，上海音乐家协会有必要把本市各有关音乐表演团体、音乐院校、有关单位的从事艺术档案家

们的人们组织起来，建立、持有一支队伍，成立上海音乐家协会艺术档案专业委员会，加强联系，交流从事艺术档案的经验、体会，提高音乐活动的艺术档案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无疑是事半功倍的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建树。

在中国。今后的“倚声填词”高手，又会是谁呢？

三十多年来，港台两地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歌词作家，黄骅、刘家基、琼瑶、黄霑、罗大佑、叶佳修、李宗盛、娃娃（李玉玉）、林夕产，组成了星光璀璨的歌词群体。其中最为耀眼夺目的是王侠奴和黄霑，他们分别是港台两地填词家的代表，他们又与大陆的乔羽并称为中国“词坛三杰”。

黄霑是香港才子，一个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多面手。他自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在一家广告公司任创作总监，三年后在另一家广告公司担任负责创作事宜的总经理，最后他已创办电影事业有限公司，并任主席。他才华横溢，精力旺盛，在经营公司的同时，他还为几家报纸撰写专栏文章，并参与编剧、填词、作曲、客串演出，多管齐下，均有所获。但影响最大、“粉丝”最多的是他“倚声填词”的歌词作品。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香港歌手张明敏的一曲《我的中国心》（王福龄曲），打动了无数听众，歌曲的词作者正是黄霑。1988年冬，我在香港见到黄霑。那天，他给了我一个叫“倚真填词”的故事：一天，作曲家顾嘉辉打电话给他，请他为电视剧《上海滩》主题歌填词，刚把自己谱好的曲子唱给他听。当晚，黄霑美美地洗了一个澡，一边酝酿歌词。很快他把歌词写好，马上通过电话，把填好词的曲谱唱给顾嘉辉听，顾十分满意。不久，《上海滩》在大陆放映，轰动全国，歌曲被争相传唱。他谦虚地说：“我在歌词中写了黄浦江，不知知位不到位？”可惜，这位歌词大师为他的事业付出太多，过度劳累，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王侠奴被誉为台湾“词坛泰斗”。他长期从事新闻事业，因为邓丽君写歌而蜚声中外。他一生写作50年，创作了3000余首作品，成为台湾地区词坛的风云人物。

其实，王侠奴和邓丽君只有一面之交。那是一次歌唱比赛，邓是小歌手，庄是大评委，两人一见如故，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们又是半个老乡，庄出生于北京，邓老家在河北，都感觉很亲切。

1979年11月，一位导演邀约王侠奴写歌词，听说歌曲由邓丽君演唱，王侠奴很高兴地接受了。他写什么呢？他想起了邓丽君，一个小女孩，脸圆圆的，声音甜甜的，连笑起来也是甜甜的。邓丽君的形象清晰地浮在王侠奴的眼前。“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王侠奴灵感如电，文思喷涌，他用不到五分钟时间，依照一首印尼民歌重新填写了歌词，题目就是《甜蜜蜜》。王侠奴和邓丽君时有书信往来。王侠奴像对待女儿一样，帮助她鼓励她。在邓丽君的心目中，王侠奴然是自己的恩师和慈父，在信中表达自己的思念、倾诉心中的苦闷，出国演出总会带一些礼物送给她。除《甜蜜蜜》外，王侠奴还为邓丽君写了《小城故事》、《又见炊烟》、《小茶花》、《丝丝小雨》、《小路》、《南海姑娘》等歌词。王侠奴和邓丽丽的合作，那是一种缘分。1995年5月，邓丽君在泰国清迈逝世，王侠奴上噩耗，伤心不已。那时，他身在大陆重庆，委托儿子献上一束香，代他为邓丽君送行。20年后的2016年，一代大师王侠也离开人世。又一个词坛俊杰走了。

在中国。今后的“倚声填词”高手，又会是谁呢？

扎达尔的海风琴

刘志康

常来的专业户。年轻人则都在台阶上三五成群，或躺或坐。我们也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发呆。远望海天一色，宠辱皆忘，心旷神怡；在旅途中能像这样，把脑子完全放空，静静地在一个地方一坐几小时，实在是很少有的。

阳光很好，碧蓝的海一望无际。渐渐澄红，湛蓝的天色有点变化，多了一抹橙红。圆润的红日越来越大，越来越靠近地平线。人们似乎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那壮丽的一刻。突然，不知道哪里，发出了一声深沉的歌吟，猝不及防，几乎令我们吓了一跳。这声音来自我们的身下，来自大海的深处。慢慢地，此起彼伏；随后，铿锵铿锵，噌噌吱吱，交织成一片，声势越来越大，俨然是一支乐队发出的恢宏的伴奏，以永远不会重复的乐音歌唱着太阳，歌唱着大海。

与此同时，夕阳也在款款地踩着赧赧的金波前行。最后，在海天相拥处，就像一个羞红了脸的姑娘，扯起了一匹蓝色的缎子，手回眸一笑之际，遮住了自己的脸。

这就是扎达尔的海风琴。多少年以前，有一个孩子叫尼古拉·巴希奇，他常在扎达尔的海边游玩，与大海有说不完的话。长大以后，他成了一名艺术家、建筑师，要实现自己儿时的梦

想。2005年，就是他设计了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海风琴。他在台阶下埋下了35根总长70米的不同口径，不同角度的管道，构成不同的观阶。就在他坐的台阶边，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台阶下有着了一排排的气孔，每当海浪涌入管中，海风吹入音孔，在气压提升的压力下，就会发出类似管风琴的声音，悠然自得地鸣起来，看起来肯定是

收集、整理音乐史料，一般，只有专业工作者才会关心。近日在书店看到有一本《上海记忆——珍藏的音乐会节目单》（上海音乐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印数为1000册），编著者是原上海东方电视台音乐频道副主编、SMG音乐部总编室主任金建民（很可惜，三年前已逝世）。书中介绍了作者收藏的从1976至2005年整整30年时间里，上海各大演出场所、各家演出团体所举办的各类音乐会的节目单。小小的节目单里，透出了时代变化的缩影。我赞赏不已。旁观者也有不同看法的人不以为然：“这些过时的节目单收集起来，也竟然可以出书。”对历史文物的价值的认识不一致常常难免。这使我想起了另一本书也曾引起过争论。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由汪耀华编著的《“文革”时期上海图书出版总目（1966至1976年）》，把近万种图书的书目，按年代、类别进行编排。当年，正是这些出版物占领着我们的文化、教育、文艺生活，所造成的时代影响和后患是我们当前值得研究的问题。该书反映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上海出版的全部书籍的状况，恰恰具有难得的、填补空白且不可多得的价值性价值。

然而，对音乐史料的获取和考证，并非是一件事务性的工作，常常充满艰辛。日前，《音乐周报》庆祝创刊40周年时，刊登了两篇有关两首作品史料考证的文章，涉及方方面面，还原真相也有一定的难度。一是关于小泽征尔是否聆听《二泉映月》；作者介绍了他考证“小泽征尔是否聆听《二泉映月》”的过程和结果；二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创作过程亲历及当事人之一、公开了此曲创作过程的真相。两文都澄清了积累几十年的不实之词，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窃以为，本市好几位主流媒体，4月29日关于“上海之春闭幕式”事关《梁祝》活动的报道用词，强调了其创作及演出的团队，也许与之有一定的关系：“闭幕式上，作曲家何占豪、陈钢，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代表60年前《梁祝》首演创作及演出团队，上台领取由“上海之春”组委会特别颁发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六十周年特别荣誉奖。”往事可鉴。人们不仅在当下回顾过去，启迪前行的智慧，还生出更多担当，希冀今天的成果能荫泽后人。今人文实，不生着眼于“让历史告诉今天”，还不断希冀于后人察今；让今天书写的历史能告诉未来。未来是属于向前发展的人们！

岁月更替，人事代谢。越来越多的今天变成过去。而随着科技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社会的发展、变化也日益迅忽，前文中所述的实例，足以引起业界对艺术档案的重视了吧？当下，随着信息越来越庞大，良莠混杂，以讹传讹有之，常常一时真假难辨。而音乐史料事关人、事的有无、真伪、毁誉、存废，以供后人研究和总结、从历史中汲取走向未来的智慧。它们的收集、积累、整理、编写、保存等工作，要求从业者除了具有基本的写作能力外，还涉及到多种专业知识、技能和设备及技术手段，如档案学、中外音乐史（尤其是上海音乐史）、音乐欣赏、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计算机操作及多媒体制作等，工作相当繁重而困难；但值得为之努力和献身。然而，目前业界各有关单位领导对艺术档案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各单位的起步时间和基础工作、人员资源、技术手段参差不齐，亟需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资源共享等等。而且，各单位除了自身的业务外，涉及全市性的各项音乐活动的资料的收集需要团结、协作。因此，上海音乐家协会有必要把本市各有关音乐表演团体、音乐院校、有关单位的从事艺术档案家

们的人们组织起来，建立、持有一支队伍，成立上海音乐家协会艺术档案专业委员会，加强联系，交流从事艺术档案的经验、体会，提高音乐活动的艺术档案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无疑是事半功倍的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建树。

在中国。今后的“倚声填词”高手，又会是谁呢？

三十多年来，港台两地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歌词作家，黄骅、刘家基、琼瑶、黄霑、罗大佑、叶佳修、李宗盛、娃娃（李玉玉）、林夕产，组成了星光璀璨的歌词群体。其中最为耀眼夺目的是王侠奴和黄霑，他们分别是港台两地填词家的代表，他们又与大陆的乔羽并称为中国“词坛三杰”。

黄霑是香港才子，一个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多面手。他自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在一家广告公司任创作总监，三年后在另一家广告公司担任负责创作事宜的总经理，最后他已创办电影事业有限公司，并任主席。他才华横溢，精力旺盛，在经营公司的同时，他还为几家报纸撰写专栏文章，并参与编剧、填词、作曲、客串演出，多管齐下，均有所获。但影响最大、“粉丝”最多的是他“倚声填词”的歌词作品。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香港歌手张明敏的一曲《我的中国心》（王福龄曲），打动了无数听众，歌曲的词作者正是黄霑。1988年冬，我在香港见到黄霑。那天，他给了我一个叫“倚真填词”的故事：一天，作曲家顾嘉辉打电话给他，请他为电视剧《上海滩》主题歌填词，刚把自己谱好的曲子唱给他听。当晚，黄霑美美地洗了一个澡，一边酝酿歌词。很快他把歌词写好，马上通过电话，把填好词的曲谱唱给顾嘉辉听，顾十分满意。不久，《上海滩》在大陆放映，轰动全国，歌曲被争相传唱。他谦虚地说：“我在歌词中写了黄浦江，不知知位不到位？”可惜，这位歌词大师为他的事业付出太多，过度劳累，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王侠奴被誉为台湾“词坛泰斗”。他长期从事新闻事业，因为邓丽君写歌而蜚声中外。他一生写作50年，创作了3000余首作品，成为台湾地区词坛的风云人物。

其实，王侠奴和邓丽君只有一面之交。那是一次歌唱比赛，邓是小歌手，庄是大评委，两人一见如故，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们又是半个老乡，庄出生于北京，邓老家在河北，都感觉很亲切。

1979年11月，一位导演邀约王侠奴写歌词，听说歌曲由邓丽君演唱，王侠奴很高兴地接受了。他写什么呢？他想起了邓丽君，一个小女孩，脸圆圆的，声音甜甜的，连笑起来也是甜甜的。邓丽君的形象清晰地浮在王侠奴的眼前。“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王侠奴灵感如电，文思喷涌，他用不到五分钟时间，依照一首印尼民歌重新填写了歌词，题目就是《甜蜜蜜》。王侠奴和邓丽君时有书信往来。王侠奴像对待女儿一样，帮助她鼓励她。在邓丽君的心目中，王侠奴然是自己的恩师和慈父，在信中表达自己的思念、倾诉心中的苦闷，出国演出总会带一些礼物送给她。除《甜蜜蜜》外，王侠奴还为邓丽君写了《小城故事》、《又见炊烟》、《小茶花》、《丝丝小雨》、《小路》、《南海姑娘》等歌词。王侠奴和邓丽丽的合作，那是一种缘分。1995年5月，邓丽君在泰国清迈逝世，王侠奴上噩耗，伤心不已。那时，他身在大陆重庆，委托儿子献上一束香，代他为邓丽君送行。20年后的2016年，一代大师王侠也离开人世。又一个词坛俊杰走了。

在中国。今后的“倚声填词”高手，又会是谁呢？

常来的专业户。年轻人则都在台阶上三五成群，或躺或坐。我们也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发呆。远望海天一色，宠辱皆忘，心旷神怡；在旅途中能像这样，把脑子完全放空，静静地在一个地方一坐几小时，实在是很少有的。

阳光很好，碧蓝的海一望无际。渐渐澄红，湛蓝的天色有点变化，多了一抹橙红。圆润的红日越来越大，越来越靠近地平线。人们似乎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那壮丽的一刻。突然，不知道哪里，发出了一声深沉的歌吟，猝不及防，几乎令我们吓了一跳。这声音来自我们的身下，来自大海的深处。慢慢地，此起彼伏；随后，铿锵铿锵，噌噌吱吱，交织成一片，声势越来越大，俨然是一支乐队发出的恢宏的伴奏，以永远不会重复的乐音歌唱着太阳，歌唱着大海。

与此同时，夕阳也在款款地踩着赧赧的金波前行。最后，在海天相拥处，就像一个羞红了脸的姑娘，扯起了一匹蓝色的缎子，手回眸一笑之际，遮住了自己的脸。

这就是扎达尔的海风琴。多少年以前，有一个孩子叫尼古拉·巴希奇，他常在扎达尔的海边游玩，与大海有说不完的话。长大以后，他成了一名艺术家、建筑师，要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2005年，就是他设计了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海风琴。他在台阶下埋下了35根总长70米的不同口径，不同角度的管道，构成不同的观阶。就在他坐的台阶边，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台阶下有着了一排排的气孔，每当海浪涌入管中，海风吹入音孔，在气压提升的压力下，就会发出类似管风琴的声音，悠然自得地鸣起来，看起来肯定是

收集、整理音乐史料，一般，只有专业工作者才会关心。近日在书店看到有一本《上海记忆——珍藏的音乐会节目单》（上海音乐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印数为1000册），编著者是原上海东方电视台音乐频道副主编、SMG音乐部总编室主任金建民（很可惜，三年前已逝世）。书中介绍了作者收藏的从1976至2005年整整30年时间里，上海各大演出场所、各家演出团体所举办的各类音乐会的节目单。小小的节目单里，透出了时代变化的缩影。我赞赏不已。旁观者也有不同看法的人不以为然：“这些过时的节目单收集起来，也竟然可以出书。”对历史文物的价值的认识不一致常常难免。这使我想起了另一本书也曾引起过争论。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由汪耀华编著的《“文革”时期上海图书出版总目（1966至1976年）》，把近万种图书的书目，按年代、类别进行编排。当年，正是这些出版物占领着我们的文化、教育、文艺生活，所造成的时代影响和后患是我们当前值得研究的问题。该书反映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上海出版的全部书籍的状况，恰恰具有难得的、填补空白且不可多得的价值性价值。

然而，对音乐史料的获取和考证，并非是一件事务性的工作，常常充满艰辛。日前，《音乐周报》庆祝创刊40周年时，刊登了两篇有关两首作品史料考证的文章，涉及方方面面，还原真相也有一定的难度。一是关于小泽征尔是否聆听《二泉映月》；作者介绍了他考证“小泽征尔是否聆听《二泉映月》”的过程和结果；二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创作过程亲历及当事人之一、公开了此曲创作过程的真相。两文都澄清了积累几十年的不实之词，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窃以为，本市好几位主流媒体，4月29日关于“上海之春闭幕式”事关《梁祝》活动的报道用词，强调了其创作及演出的团队，也许与之有一定的关系：“闭幕式上，作曲家何占豪、陈钢，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代表60年前《梁祝》首演创作及演出团队，上台领取由“上海之春”组委会特别颁发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六十周年特别荣誉奖。”往事可鉴。人们不仅在当下回顾过去，启迪前行的智慧，还生出更多担当，希冀今天的成果能荫泽后人。今人文实，不生着眼于“让历史告诉今天”，还不断希冀于后人察今；让今天书写的历史能告诉未来。未来是属于向前发展的人们！

岁月更替，人事代谢。越来越多的今天变成过去。而随着科技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社会的发展、变化也日益迅忽，前文中所述的实例，足以引起业界对艺术档案的重视了吧？当下，随着信息越来越庞大，良莠混杂，以讹传讹有之，常常一时真假难辨。而音乐史料事关人、事的有无、真伪、毁誉、存废，以供后人研究和总结、从历史中汲取走向未来的智慧。它们的收集、积累、整理、编写、保存等工作，要求从业者除了具有基本的写作能力外，还涉及到多种专业知识、技能和设备及技术手段，如档案学、中外音乐史（尤其是上海音乐史）、音乐欣赏、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计算机操作及多媒体制作等，工作相当繁重而困难；但值得为之努力和献身。然而，目前业界各有关单位领导对艺术档案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各单位的起步时间和基础工作、人员资源、技术手段参差不齐，亟需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资源共享等等。而且，各单位除了自身的业务外，涉及全市性的各项音乐活动的资料的收集需要团结、协作。因此，上海音乐家协会有必要把本市各有关音乐表演团体、音乐院校、有关单位的从事艺术档案家

们的人们组织起来，建立、持有一支队伍，成立上海音乐家协会艺术档案专业委员会，加强联系，交流从事艺术档案的经验、体会，提高音乐活动的艺术档案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无疑是事半功倍的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建树。

在中国。今后的“倚声填词”高手，又会是谁呢？

三十多年来，港台两地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歌词作家，黄骅、刘家基、琼瑶、黄霑、罗大佑、叶佳修、李宗盛、娃娃（李玉玉）、林夕产，组成了星光璀璨的歌词群体。其中最为耀眼夺目的是王侠奴和黄霑，他们分别是港台两地填词家的代表，他们又与大陆的乔羽并称为中国“词坛三杰”。

黄霑是香港才子，一个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多面手。他自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在一家广告公司任创作总监，三年后在另一家广告公司担任负责创作事宜的总经理，最后他已创办电影事业有限公司，并任主席。他才华横溢，精力旺盛，在经营公司的同时，他还为几家报纸撰写专栏文章，并参与编剧、填词、作曲、客串演出，多管齐下，均有所获。但影响最大、“粉丝”最多的是他“倚声填词”的歌词作品。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香港歌手张明敏的一曲《我的中国心》（王福龄曲），打动了无数听众，歌曲的词作者正是黄霑。1988年冬，我在香港见到黄霑。那天，他给了我一个叫“倚真填词”的故事：一天，作曲家顾嘉辉打电话给他，请他为电视剧《上海滩》主题歌填词，刚把自己谱好的曲子唱给他听。当晚，黄霑美美地洗了一个澡，一边酝酿歌词。很快他把歌词写好，马上通过电话，把填好词的曲谱唱给顾嘉辉听，顾十分满意。不久，《上海滩》在大陆放映，轰动全国，歌曲被争相传唱。他谦虚地说：“我在歌词中写了黄浦江，不知知位不到位？”可惜，这位歌词大师为他的事业付出太多，过度劳累，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王侠奴被誉为台湾“词坛泰斗”。他长期从事新闻事业，因为邓丽君写歌而蜚声中外。他一生写作50年，创作了3000余首作品，成为台湾地区词坛的风云人物。

其实，王侠奴和邓丽君只有一面之交。那是一次歌唱比赛，邓是小歌手，庄是大评委，两人一见如故，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们又是半个老乡，庄出生于北京，邓老家在河北，都感觉很亲切。

1979年11月，一位导演邀约王侠奴写歌词，听说歌曲由邓丽君演唱，王侠奴很高兴地接受了。他写什么呢？他想起了邓丽君，一个小女孩，脸圆圆的，声音甜甜的，连笑起来也是甜甜的。邓丽君的形象清晰地浮在王侠奴的眼前。“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王侠奴灵感如电，文思喷涌，他用不到五分钟时间，依照一首印尼民歌重新填写了歌词，题目就是《甜蜜蜜》。王侠奴和邓丽君时有书信往来。王侠奴像对待女儿一样，帮助她鼓励她。在邓丽君的心目中，王侠奴然是自己的恩师和慈父，在信中表达自己的思念、倾诉心中的苦闷，出国演出总会带一些礼物送给她。除《甜蜜蜜》外，王侠奴还为邓丽君写了《小城故事》、《又见炊烟》、《小茶花》、《丝丝小雨》、《小路》、《南海姑娘》等歌词。王侠奴和邓丽丽的合作，那是一种缘分。1995年5月，邓丽君在泰国清迈逝世，王侠奴上噩耗，伤心不已。那时，他身在大陆重庆，委托儿子献上一束香，代他为邓丽君送行。20年后的2016年，一代大师王侠也离开人世。又一个词坛俊杰走了。

在中国。今后的“倚声填词”高手，又会是谁呢？

常来的专业户。年轻人则都在台阶上三五成群，或躺或坐。我们也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发呆。远望海天一色，宠辱皆忘，心旷神怡；在旅途中能像这样，把脑子完全放空，静静地在一个地方一坐几小时，实在是很少有的。

阳光很好，碧蓝的海一望无际。渐渐澄红，湛蓝的天色有点变化，多了一抹橙红。圆润的红日越来越大，越来越靠近地平线。人们似乎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那壮丽的一刻。突然，不知道哪里，发出了一声深沉的歌吟，猝不及防，几乎令我们吓了一跳。这声音来自我们的身下，来自大海的深处。慢慢地，此起彼伏；随后，铿锵铿锵，噌噌吱吱，交织成一片，声势越来越大，俨然是一支乐队发出的恢宏的伴奏，以永远不会重复的乐音歌唱着太阳，歌唱着大海。

与此同时，夕阳也在款款地踩着赧赧的金波前行。最后，在海天相拥处，就像一个羞红了脸的姑娘，扯起了一匹蓝色的缎子，手回眸一笑之际，遮住了自己的脸。

这就是扎达尔的海风琴。多少年以前，有一个孩子叫尼古拉·巴希奇，他常在扎达尔的海边游玩，与大海有说不完的话。长大以后，他成了一名艺术家、建筑师，要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2005年，就是他设计了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海风琴。他在台阶下埋下了35根总长70米的不同口径，不同角度的管道，构成不同的观阶。就在他坐的台阶边，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台阶下有着了一排排的气孔，每当海浪涌入管中，海风吹入音孔，在气压提升的压力下，就会发出类似管风琴的声音，悠然自得地鸣起来，看起来肯定是

收集、整理音乐史料，一般，只有专业工作者才会关心。近日在书店看到有一本《上海记忆——珍藏的音乐会节目单》（上海音乐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印数为1000册），编著者是原上海东方电视台音乐频道副主编、SMG音乐部总编室主任金建民（很可惜，三年前已逝世）。书中介绍了作者收藏的从1976至2005年整整30年时间里，上海各大演出场所、各家演出团体所举办的各类音乐会的节目单。小小的节目单里，透出了时代变化的缩影。我赞赏不已。旁观者也有不同看法的人不以为然：“这些过时的节目单收集起来，也竟然可以出书。”对历史文物的价值的认识不一致常常难免。这使我想起了另一本书也曾引起过争论。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由汪耀华编著的《“文革”时期上海图书出版总目（1966至1976年）》，把近万种图书的书目，按年代、类别进行编排。当年，正是这些出版物占领着我们的文化、教育、文艺生活，所造成的时代影响和后患是我们当前值得研究的问题。该书反映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上海出版的全部书籍的状况，恰恰具有难得的、填补空白且不可多得的价值性价值。

然而，对音乐史料的获取和考证，并非是一件事务性的工作，常常充满艰辛。日前，《音乐周报》庆祝创刊40周年时，刊登了两篇有关两首作品史料考证的文章，涉及方方面面，还原真相也有一定的难度。一是关于小泽征尔是否聆听《二泉映月》；作者介绍了他考证“小泽征尔是否聆听《二泉映月》”的过程和结果；二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创作过程亲历及当事人之一、公开了此曲创作过程的真相。两文都澄清了积累几十年的不实之词，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窃以为，本市好几位主流媒体，4月29日关于“上海之春闭幕式”事关《梁祝》活动的报道用词，强调了其创作及演出的团队，也许与之有一定的关系：“闭幕式上，作曲家何占豪、陈钢，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代表60年前《梁祝》首演创作及演出团队，上台领取由“上海之春”组委会特别颁发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六十周年特别荣誉奖。”往事可鉴。人们不仅在当下回顾过去，启迪前行的智慧，还生出更多担当，希冀今天的成果能荫泽后人。今人文实，不生着眼于“让历史告诉今天”，还不断希冀于后人察今；让今天书写的历史能告诉未来。未来是属于向前发展的人们！

岁月更替，人事代谢。越来越多的今天变成过去。而随着科技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社会的发展、变化也日益迅忽，前文中所述的实例，足以引起业界对艺术档案的重视了吧？当下，随着信息越来越庞大，良莠混杂，以讹传讹有之，常常一时真假难辨。而音乐史料事关人、事的有无、真伪、毁誉、存废，以供后人研究和总结、从历史中汲取走向未来的智慧。它们的收集、积累、整理、编写、保存等工作，要求从业者除了具有基本的写作能力外，还涉及到多种专业知识、技能和设备及技术手段，如档案学、中外音乐史（尤其是上海音乐史）、音乐欣赏、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计算机操作及多媒体制作等，工作相当繁重而困难；但值得为之努力和献身。然而，目前业界各有关单位领导对艺术档案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各单位的起步时间和基础工作、人员资源、技术手段参差不齐，亟需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资源共享等等。而且，各单位除了自身的业务外，涉及全市性的各项音乐活动的资料的收集需要团结、协作。因此，上海音乐家协会有必要把本市各有关音乐表演团体、音乐院校、有关单位的从事艺术档案家

们的人们组织起来，建立、持有一支队伍，成立上海音乐家协会艺术档案专业委员会，加强联系，交流从事艺术档案的经验、体会，提高音乐活动的艺术档案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无疑是事半功倍的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建树。

想保持其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最重要的支柱就是作品、原创作品、经典作品！

走进张正宜老师家的客厅，即刻就被一股充满艺术气息的氛围所感染；一架黑色的三角钢琴摆放在客厅的左后方，盖上了放满了张正宜不同年代所拍摄的艺术照，演出照和家人的合影照。每一张照片上的张正宜，都笑得那么甜蜜和愉悦。最引人注目的是左侧墙壁上悬挂的两幅人物油画，一幅是女孩子年轻时的肖像，身穿V领的蓝色浪花连衫裙，颀瘦过的卷发飘披双肩，双目神采奕奕，显得那么青春靓丽。另一幅展现的是张正宜两年前的肖像，一头齐耳的短发，一张笑吟吟的福相脸，鼻梁上架着一副眼睛，身着粉红色的外衣，一瞧就是位有高雅气质的老人。

张正宜是个爽快人，同笔者没什么寒暄，就直接进入了采访的主题。
情系缘牵，豆蔻年华入门
从小就喜欢唱歌弹琴的张正宜，15岁那年考进了行知学校，开始与音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16岁进入了上海广播业余合唱团。从行知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榆林区（后划归到杨浦区）的一所职工子弟学校任音乐老师。刚解放的上海，职工子弟学校其实就是文化扫盲学校，让那些原本上不起学校的职工子弟开始学习文化。所以，她所教的学生年龄基本上都比她大。学校很简陋，所谓的音乐器材也就是一把很旧的钢琴，更谈不上有什么音乐教室，哪个班级要上音乐课了，就让学校的教工把那架钢琴搬过去。

1956年的暑假期间，上海广播乐团招收新团员，职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很支持张正宜去报考。因为那年来就是上海广播业余合唱团的队员，乐团的许多老师都认识她，因而她顺利地地被上海广播乐团录取了。可是到快要开学时，她还没收到上海广播乐团的录取通知书，而职工子弟学校又以为她要调走了，也没有安排她的教学课程，这下可把张正宜急坏了。后经打听，原来上海广播乐团的调令早就下发了，不知什么原因在榆林区的相关部门中搁浅了。上海广播乐团的人事部门也不等榆林区的手续了，就直接把她招入了乐团。

刚进上海广播乐团的张正宜，主要任务是参加合唱的排练和演出，经常演出的地方为上海音乐厅。同时在团内先后向孙经生、黄蘧老师学习声乐。这是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房间，开门的墙贴放了一个书橱，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CD，有音乐类的，也有无关音乐的；书橱前放一架古筝，正好把书橱下半部分的抽屉堵住了，每次从抽屉里拿东西，都要把古筝抬起来，才能打开抽屉；房里靠墙放了一台钢琴，钢琴上有一个小的玻璃制的钢琴模型，以及一些装裱好的照片；钢琴对面靠墙的沙发上，放着几把垫和一些谱本；沙发上墙面上挂着一幅裱好的画，远看是一座典型的教堂，有着高而高的哥特式尖顶，近看却会发现这是由无数的五线谱和密密麻麻的各类音符构成的，颇合《音乐是流动的建筑》的意味。这个充满音乐气息的不大的朴素房间，正是我的老师——翁镇发先生、平时生活、学习、练琴和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

“你记得你刚才吃得好好吗？你听我吹，用心听。”小小的房里，坐着一老一小两个人，手里拿着各自的乐器——笙；两人面前有一个谱架，上面放着乐谱——《姑苏行》。年长的翁先生正在给年少的我进行演示。

“听到了吗？这一段慢板很强的强，该弱的弱，你那样‘弄’着吹，音乐会好听吗？”先生看我去年纪并不大，一头黑发夹杂着些许银丝，炯炯有神的眼神好像能看穿学生的内心；脸上总是挂着和蔼的笑容，让人禁不住想要亲近；但是学生犯错的时候，他的严肃表情总是让人感到“发怵”。

我还记得第一次跟翁老师见面的情景。那天我是和师兄一起去的，是我第一次跟翁老师上课，也是我退伍回来以后第一次上课。本来我已经准备放弃表演这条路，专修音乐理论，毕竟已有两年时间没碰过笙，能不能重新拾起来还是个问题呢。我没有想到的是，学院现在为我们“个别把笙”，请了翁老师给我们上课。我知道，翁老师可是民乐界资深的著名笙演奏家，他数十年在国内独奏笙的演出屡不胜举，获得了广泛的声誉，积累了丰富的演奏和教学经验，不仅名震国内外乐坛，而且桃李满天下。我们上轻音乐学院能请来翁老师这样的大家给我们上轻音乐子上课，是学院的远见卓识，也是我们学生的荣幸。我知道这机会有多难得！我虽然有实际情况，但无法拒绝犹豫不决，能跟翁老师上课，是许

乐。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际，上海广播乐团与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乐团联合排练了《十三陵水库》、《幸福河》等4个大合唱，有交响乐伴奏，司徒汉等任指挥。在此演出中，张正宜尽展歌唱的才华。

1964年，张正宜被挑选加入了现代舞剧《白毛女》剧组，作为白毛女角色唱段的B角之一（A角为朱逢博），并在北京参加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演出。回到上海后，有关部门要求《白毛女》剧组加紧排练，准备出国演出。但在最后出国的演员名单中，张正宜的名字被删了。当时对出国人员的政治要求很严格，原因是怀疑她的丈夫，原上海广播乐团的双簧管演奏员，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其实就是认识几位国外乐队中的双簧管演奏员而已），她因此受牵连，出国演出受阻。

雨过天晴，激情首唱《红杉树》
“文革”开始后，滞留在乐团的张正宜，变成了无事可做的闲人，这对一位钟爱唱歌的演员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真可谓无巧不成书，此时的上海民族乐团时常在社会上演出，但整套的器乐演奏节目显得有些单调，想穿插一些歌唱类的节目，因缺少歌唱演员，就到已更名为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原上海广播乐团），把张正宜借调了过去。从借调到上海民族乐团起，张正宜的歌唱事业就基本上以独唱为主了。

在采访中，张正宜说起了在演出生涯中唯一一次，但又令她终生难忘的“失声事件”：有一次上海电视台当场直播她演唱的《南泥湾》一歌。当时的电视直播就是现场演唱，没有事先录制的。“花篮的花儿香，我来了唱一唱”。她上台刚唱了两句，突然间失声了，怎么也唱不出声音来。观众们只听到乐队的正常伴奏声，能看到张正宜的嘴合着乐队的伴奏在一张一合，但就是听不到她的歌唱的声音，观众都以为是电视台直播出了问题。“演出”完毕后到了后台，她大哭起来，她不是担心自己的声带出问题，而是感到对不起观众们了。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之行，使中美之间紧闭的外交大门敞开了，尼克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加利福尼亚特有的珍稀乔木红杉树

老而弥坚的“红杉树”——访著名歌唱家张正宜

孔鸿声

作为礼物。此时与张正宜同在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一起工作的著名作曲家沈圣新，看到这些新闻后，联想到红杉树将落户西湖边，以象征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心潮起伏，激发他为此要写一首歌的愿望。经与词作者史俊和茅晓峰合作，很快就写出了《红杉树》一歌，沈圣新把谱好的《红杉树》邀请张正宜第一个试唱。从沈圣新那儿接过谱后，张正宜满浙江音乐的要求很严格，原因是怀疑她的丈夫，原上海广播乐团的双簧管演奏员，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其实就是认识几位国外乐队中的双簧管演奏员而已），她因此受牵连，出国演出受阻。

雨过天晴，激情首唱《红杉树》
“文革”开始后，滞留在乐团的张正宜，变成了无事可做的闲人，这对一位钟爱唱歌的演员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真可谓无巧不成书，此时的上海民族乐团时常在社会上演出，但整套的器乐演奏节目显得有些单调，想穿插一些歌唱类的节目，因缺少歌唱演员，就到已更名为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原上海广播乐团），把张正宜借调了过去。从借调到上海民族乐团起，张正宜的歌唱事业就基本上以独唱为主了。

月光轻骑，人过中年掌帅印
唱什么歌？抒什么情？这是张正宜很重视的一个问题！她主张用歌声去滋润人们的心灵，去赞美火热的生活。当她得知工读学校的学生是一些不幸失足的青年，就非常难过。于是，她深入到此类学校去给他们演唱《她呀，她》这首歌，用她的歌声温暖了一颗朵受伤的小花，感动得学生们都流下了眼泪。

当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消息传来，她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深情地唱起了《怀念刘少奇主席》，热情讴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她说她的使命就是用一首首歌调健康，情越高昂的歌唱，抒发情感，抒发理想，用歌声表达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情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股“个人承包，自负盈亏”的风潮弥漫各行各业，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受此影响，也搞起了各种小型的演出队，工资由团里发放，奖金就有各种小型演出队自行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张正宜受命领衔“招集”了一些人马，组成了一支“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月光轻音乐队”，开始“行走江湖”。“月光轻音乐队”先

后南下广东、西入四川，挺进河南等地演出，一演就是几个月，家里人基本看不到她的身影。辛辛苦苦地到处奔波，其收入却微乎其微，每一场的演出费只有5元钱。尽管只有这点“辛苦费”，但无论是演唱的还是伴奏的演员，对每一场、对每一个节目的演出，仍然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从不马虎对待，可以说，体现了一种高尚的素质。

通过率领“月光轻音乐队”的外出巡演，不仅充分锻炼了张正宜吃苦耐劳的意志和与队员们同甘共苦的精神，也使上级部门更加了解和掌握丁张正宜的领导艺术水平。1986年，有关部门正式任命张正宜为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团长，人过中年的她，开始执掌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的帅印。虽然已是一团之长，但她并没有那种盛气傲慢的“官架子”，在认真处理好团长主管的那些繁杂的行政事务外，她坚持上台演出，尽一名演员应有的职责。1988年，正逢她“知天年”之年，即在美琪大戏院举办了自己最后一场“独唱音乐会”。此时的她已是名震声在外，“独唱音乐会”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据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连大门的玻璃都被挤碎了。不得已，连彩排也放了观众。她的这次“独唱音乐会”，连续演出了5场，这在当时的演艺界，是少有的盛况。

“知道了吧，要照着谱子来，不然是谱子干嘛？”先生严肃地说道。我望着老师一丝不苟的神情，用力地点了点头。“稍微加快速度，慢的练熟了，你才能把速度加上，再来。”也是在后来，我在网上找到一段老师为陆春龄老师伴奏《鹧鸪飞》的视频，当时陆老师已近90高龄了，可那老师的精气神仍在。有一次我才从和老师的闲谈中得知，他现在已70岁了，但仍然每天坚持练琴。从早到晚。那时起，我突然感觉老师 and 陆春龄老师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把一生献给了音乐，对于音乐的理解，显得那么神圣而虔诚，都以一种“入世”的态度去演绎音乐，严格遵守着乐谱的“规则”，每一个音符的处理都合着“规矩”，都有着存在的理由，这也同时影响着他们这样的学生。老师于我，就好像我学艺生涯中的一座山崖，经受过风雨海浪冲击洗礼屹立不倒的山崖，让人景仰不止，更使我需要用心一生去追随、攀登的目标。

“明白了吧，不错，就是这样，回去好好练，争取下次学新的曲子。”翁老师看我又微笑地说道，“那天你就这样吧，下课。”

这些只是我抽取的随翁老师上课的一些片段、场景和感受，可能还不足以反映翁老师高尚的人格、严谨的教学和精湛的技艺。但对我来说，已经从翁老师的言传身教中获益不浅！终身难忘！

吾生也有涯，而笙也无涯。吾须将有涯之一生去攀登陈老师那样的笙之“崖”！

（作者现为上海大学音乐学院学生）

位深受群众欢迎的歌唱家。

然而，就是这位享有盛誉的歌唱家，在1984年她的舞台演唱事业正如日中天之时，她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许多可以外出赚钱的演唱“邀请”，大踏步地走进了“上海老年大学静安区老年歌唱学习班”，开始了她为老年声乐施教的拓荒之旅。至今已有了35年，她还在此授课。

作为一级演员、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又担任过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团长，无论是从她的歌唱知名度或她所担任的行政职务来说，如要“走穴”，她还有不少课。

通过率领“月光轻音乐队”的外出巡演，不仅充分锻炼了张正宜吃苦耐劳的意志和与队员们同甘共苦的精神，也使上级部门更加了解和掌握丁张正宜的领导艺术水平。1986年，有关部门正式任命张正宜为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团长，人过中年的她，开始执掌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的帅印。

虽然已是一团之长，但她并没有那种盛气傲慢的“官架子”，在认真处理好团长主管的那些繁杂的行政事务外，她坚持上台演出，尽一名演员应有的职责。1988年，正逢她“知天年”之年，即在美琪大戏院举办了自己最后一场“独唱音乐会”。此时的她已是名震声在外，“独唱音乐会”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据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连大门的玻璃都被挤碎了。不得已，连彩排也放了观众。她的这次“独唱音乐会”，连续演出了5场，这在当时的演艺界，是少有的盛况。

用心耕耘，名师育出高徒

“在那金色沙滩上，洒满银色月光，寻找往事踪影……”在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中的剧场里，100多位两鬓苍苍的老人，正在声情并茂地演唱穆老族人民歌《在那银色月光下》。欣赏着老人们字正腔圆的四声部演唱，观众很相信，他们中有许多人原来是从事声乐完全“一穷不通”的“乐盲”，而引领他们从认识五线谱上的“蝌蚪文”开始，到目前拿起五线谱想唱就唱的指导老师，就是张正宜。

张正宜的歌声优美甜润，演唱起来浓淡相宜、惟妙惟肖、声情并茂。“含情而不过，欢笑又含蓄，嗓音也堪佳，举止有余音”。这曾是一位老作曲家，在一次次“上海之春”演出中听了张正宜的演唱后，激动之余而当晚写成赠给她的一首诗。所以说，她是一位

位深受群众欢迎的歌唱家。

然而，就是这位享有盛誉的歌唱家，在1984年她的舞台演唱事业正如日中天之时，她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许多可以外出赚钱的演唱“邀请”，大踏步地走进了“上海老年大学静安区老年歌唱学习班”，开始了她为老年声乐施教的拓荒之旅。至今已有了35年，她还在此授课。

作为一级演员、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又担任过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团长，无论是从她的歌唱知名度或她所担任的行政职务来说，如要“走穴”，她还有不少课。通过率领“月光轻音乐队”的外出巡演，不仅充分锻炼了张正宜吃苦耐劳的意志和与队员们同甘共苦的精神，也使上级部门更加了解和掌握丁张正宜的领导艺术水平。1986年，有关部门正式任命张正宜为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团长，人过中年的她，开始执掌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的帅印。虽然已是一团之长，但她并没有那种盛气傲慢的“官架子”，在认真处理好团长主管的那些繁杂的行政事务外，她坚持上台演出，尽一名演员应有的职责。1988年，正逢她“知天年”之年，即在美琪大戏院举办了自己最后一场“独唱音乐会”。此时的她已是名震声在外，“独唱音乐会”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据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连大门的玻璃都被挤碎了。不得已，连彩排也放了观众。她的这次“独唱音乐会”，连续演出了5场，这在当时的演艺界，是少有的盛况。

用心耕耘，名师育出高徒
“在那金色沙滩上，洒满银色月光，寻找往事踪影……”在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中的剧场里，100多位两鬓苍苍的老人，正在声情并茂地演唱穆老族人民歌《在那银色月光下》。欣赏着老人们字正腔圆的四声部演唱，观众很相信，他们中有许多人原来是从事声乐完全“一穷不通”的“乐盲”，而引领他们从认识五线谱上的“蝌蚪文”开始，到目前拿起五线谱想唱就唱的指导老师，就是张正宜。

张正宜的歌声优美甜润，演唱起来浓淡相宜、惟妙惟肖、声情并茂。“含情而不过，欢笑又含蓄，嗓音也堪佳，举止有余音”。这曾是一位老作曲家，在一次次“上海之春”演出中听了张正宜的演唱后，激动之余而当晚写成赠给她的一首诗。所以说，她是一位深受群众欢迎的歌唱家。

然而，就是这位享有盛誉的歌唱家，在1984年她的舞台演唱事业正如日中天之时，她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许多可以外出赚钱的演唱“邀请”，大踏步地走进了“上海老年大学静安区老年歌唱学习班”，开始了她为老年声乐施教的拓荒之旅。至今已有了35年，她还在此授课。

通过率领“月光轻音乐队”的外出巡演，不仅充分锻炼了张正宜吃苦耐劳的意志和与队员们同甘共苦的精神，也使上级部门更加了解和掌握丁张正宜的领导艺术水平。1986年，有关部门正式任命张正宜为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团长，人过中年的她，开始执掌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的帅印。虽然已是一团之长，但她并没有那种盛气傲慢的“官架子”，在认真处理好团长主管的那些繁杂的行政事务外，她坚持上台演出，尽一名演员应有的职责。1988年，正逢她“知天年”之年，即在美琪大戏院举办了自己最后一场“独唱音乐会”。此时的她已是名震声在外，“独唱音乐会”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据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连大门的玻璃都被挤碎了。不得已，连彩排也放了观众。她的这次“独唱音乐会”，连续演出了5场，这在当时的演艺界，是少有的盛况。

“知道了吧，要照着谱子来，不然是谱子干嘛？”先生严肃地说道。我望着老师一丝不苟的神情，用力地点了点头。“稍微加快速度，慢的练熟了，你才能把速度加上，再来。”

也是在后来，我在网上找到一段老师为陆春龄老师伴奏《鹧鸪飞》的视频，当时陆老师已近90高龄了，可那老师的精气神仍在。有一次我才从和老师的闲谈中得知，他现在已70岁了，但仍然每天坚持练琴。从早到晚。那时起，我突然感觉老师 and 陆春龄老师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把一生献给了音乐，对于音乐的理

解，显得那么神圣而虔诚，都以一种“入世”的态度去演绎音乐，严格遵守着乐谱的“规则”，每一个音符的处理都合着“规矩”，都有着存在的理由，这也同时影响着他们这样的学生。老师于我，就好像我学艺生涯中的一座山崖，经受过风雨海浪冲击洗礼屹立不倒的山崖，让人景仰不止，更使我需要用心一生去追随、攀登的目标。“明白了吧，不错，就是这样，回去好好练，争取下次学新的曲子。”翁老师看我又微笑地说道，“那天你就这样吧，下课。”

这些只是我抽取的随翁老师上课的一些片段、场景和感受，可能还不足以反映翁老师高尚的人格、严谨的教学和精湛的技艺。但对我来说，已经从翁老师的言传身教中获益不浅！终身难忘！

吾生也有涯，而笙也无涯。吾须将有涯之一生去攀登陈老师那样的笙之“崖”！

（作者现为上海大学音乐学院学生）

位深受群众欢迎的歌唱家。

然而，就是这位享有盛誉的歌唱家，在1984年她的舞台演唱事业正如日中天之时，她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许多可以外出赚钱的演唱“邀请”，大踏步地走进了“上海老年大学静安区老年歌唱学习班”，开始了她为老年声乐施教的拓荒之旅。至今已有了35年，她还在此授课。

通过率领“月光轻音乐队”的外出巡演，不仅充分锻炼了张正宜吃苦耐劳的意志和与队员们同甘共苦的精神，也使上级部门更加了解和掌握丁张正宜的领导艺术水平。1986年，有关部门正式任命张正宜为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团长，人过中年的她，开始执掌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的帅印。虽然已是一团之长，但她并没有那种盛气傲慢的“官架子”，在认真处理好团长主管的那些繁杂的行政事务外，她坚持上台演出，尽一名演员应有的职责。1988年，正逢她“知天年”之年，即在美琪大戏院举办了自己最后一场“独唱音乐会”。此时的她已是名震声在外，“独唱音乐会”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据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连大门的玻璃都被挤碎了。不得已，连彩排也放了观众。她的这次“独唱音乐会”，连续演出了5场，这在当时的演艺界，是少有的盛况。

用心耕耘，名师育出高徒
“在那金色沙滩上，洒满银色月光，寻找往事踪影……”在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中的剧场里，100多位两鬓苍苍的老人，正在声情并茂地演唱穆老族人民歌《在那银色月光下》。欣赏着老人们字正腔圆的四声部演唱，观众很相信，他们中有许多人原来是从事声乐完全“一穷不通”的“乐盲”，而引领他们从认识五线谱上的“蝌蚪文”开始，到目前拿起五线谱想唱就唱的指导老师，就是张正宜。

张正宜的歌声优美甜润，演唱起来浓淡相宜、惟妙惟肖、声情并茂。“含情而不过，欢笑又含蓄，嗓音也堪佳，举止有余音”。这曾是一位老作曲家，在一次次“上海之春”演出中听了张正宜的演唱后，激动之余而当晚写成赠给她的一首诗。所以说，她是一位深受群众欢迎的歌唱家。

然而，就是这位享有盛誉的歌唱家，在1984年她的舞台演唱事业正如日中天之时，她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许多可以外出赚钱的演唱“邀请”，大踏步地走进了“上海老年大学静安区老年歌唱学习班”，开始了她为老年声乐施教的拓荒之旅。至今已有了35年，她还在此授课。

位深受群众欢迎的歌唱家。

然而，就是这位享有盛誉的歌唱家，在1984年她的舞台演唱事业正如日中天之时，她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许多可以外出赚钱的演唱“邀请”，大踏步地走进了“上海老年大学静安区老年歌唱学习班”，开始了她为老年声乐施教的拓荒之旅。至今已有了35年，她还在此授课。

通过率领“月光轻音乐队”的外出巡演，不仅充分锻炼了张正宜吃苦耐劳的意志和与队员们同甘共苦的精神，也使上级部门更加了解和掌握丁张正宜的领导艺术水平。1986年，有关部门正式任命张正宜为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团长，人过中年的她，开始执掌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的帅印。虽然已是一团之长，但她并没有那种盛气傲慢的“官架子”，在认真处理好团长主管的那些繁杂的行政事务外，她坚持上台演出，尽一名演员应有的职责。1988年，正逢她“知天年”之年，即在美琪大戏院举办了自己最后一场“独唱音乐会”。此时的她已是名震声在外，“独唱音乐会”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据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连大门的玻璃都被挤碎了。不得已，连彩排也放了观众。她的这次“独唱音乐会”，连续演出了5场，这在当时的演艺界，是少有的盛况。

用心耕耘，名师育出高徒
“在那金色沙滩上，洒满银色月光，寻找往事踪影……”在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中的剧场里，100多位两鬓苍苍的老人，正在声情并茂地演唱穆老族人民歌《在那银色月光下》。欣赏着老人们字正腔圆的四声部演唱，观众很相信，他们中有许多人原来是从事声乐完全“一穷不通”的“乐盲”，而引领他们从认识五线谱上的“蝌蚪文”开始，到目前拿起五线谱想唱就唱的指导老师，就是张正宜。

张正宜的歌声优美甜润，演唱起来浓淡相宜、惟妙惟肖、声情并茂。“含情而不过，欢笑又含蓄，嗓音也堪佳，举止有余音”。这曾是一位老作曲家，在一次次“上海之春”演出中听了张正宜的演唱后，激动之余而当晚写成赠给她的一首诗。所以说，她是一位深受群众欢迎的歌唱家。

然而，就是这位享有盛誉的歌唱家，在1984年她的舞台演唱事业正如日中天之时，她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许多可以外出赚钱的演唱“邀请”，大踏步地走进了“上海老年大学静安区老年歌唱学习班”，开始了她为老年声乐施教的拓荒之旅。至今已有了35年，她还在此授课。

通过率领“月光轻音乐队”的外出巡演，不仅充分锻炼了张正宜吃苦耐劳的意志和与队员们同甘共苦的精神，也使上级部门更加了解和掌握丁张正宜的领导艺术水平。1986年，有关部门正式任命张正宜为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团长，人过中年的她，开始执掌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的帅印。虽然已是一团之长，但她并没有那种盛气傲慢的“官架子”，在认真处理好团长主管的那些繁杂的行政事务外，她坚持上台演出，尽一名演员应有的职责。1988年，正逢她“知天年”之年，即在美琪大戏院举办了自己最后一场“独唱音乐会”。此时的她已是名震声在外，“独唱音乐会”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据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连大门的玻璃都被挤碎了。不得已，连彩排也放了观众。她的这次“独唱音乐会”，连续演出了5场，这在当时的演艺界，是少有的盛况。

“文华大奖”是对歌剧的鼓励与鞭策

蒋力

在上海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是对全国近年来舞台艺术创作的一次检阅，其中也包括歌剧创作。我研究歌剧，所以对参加这届艺术节的四部歌剧剧目格外关心。这四部歌剧分别是：《马向阳下乡记》（山东青岛）、《松毛岭之恋》（福建）、《在希望的田野上》（浙江）和《英·雄》（湖南株洲）。个个都冲着“文华大奖”而去，但十个“大奖”中，歌剧的名额只有一个。竞争激烈，甚至近于残酷。最后获奖的是《马向阳下乡记》，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也在一些人的意料之外。现在艺术节已经结束，可以议论一下，坦率地谈谈我的看法。

一是“大奖”。以往几届艺术节上，歌剧的角逐都没有这次激烈，或者说，悬念小于别的剧种。我印象中，十一届艺术节有两部歌剧，早在开幕之前数月，我即预测陕西的《大汉苏武》能获“大奖”，理由有二：该届艺术节的东道主是陕西，《大汉苏武》也具备了相当的艺术实力，我对这个剧目的评价也较高。事实亦如我料。另一部参评的歌剧是总政的《天下黄河》，与《大汉苏武》相比，尚有不小距离。十届艺术节有三部歌剧：中国歌剧剧院的《红河谷》，福建的《土楼》和重庆的《钓鱼城》。获奖的《红河谷》，我估计不会比另两个戏的分数多出很多。九届艺术节上的歌剧有两部：中央歌剧院的《霸王别姬》和总政的《太阳宫》。前者获奖，意料之中，八届艺术节的歌剧有三部，中央歌剧院的《杜十娘》、上海歌剧剧院的《雷雨》和总政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后者获奖，名至实归。本届的歌剧剧目数量超过以往，都是民族歌剧，其中的三部相互间差距不大，竞争激烈势在必然。

《马向阳下乡记》最终的脱颖而出，榜上无名，主要是因为其精准拔俗的现实题材，还有一些不便于落在文字上的推动因素。作为歌剧，音乐如何，是最主要的衡量标准。臧云飞是一位早有成就的歌曲作曲家，但却是第一次写歌剧，说其一鸣惊人足赞许，对其音乐不够歌剧化以佳作更属中肯。艺术节期间看过《英·雄》和《马向阳下乡记》两部歌剧的一位上海老作曲家就私下直言与《马》的音乐不如《英·雄》。我对《马》的看法也有一个转变过程：第一次是当歌剧去看，不少地方都觉得别扭、欠缺；第二次是当喜剧去看，忘掉它是歌剧，自然觉得面目清新，耐耐回味；第三次是当喜剧歌去看，不仅加深了喜爱，还在“一剧一评”的会上为其中一段谈话的唱段特别叫了好。歌剧是综合艺术，方方面面都要考量，所以，即使我对《马》剧的印象越来越好，但如果我是评委，说句实话，“大奖”的这一票，我可能不会投给

从事实剧评论的人，常人认为所言都是马后炮，其实，我何尝不想做马卒呢？至少我也具备鞍前马后地随歌剧同行的经验和能力。某次会议上，我就曾提出：评论应当尽早介入，进入创作环节为好。当即遭到某人的坚决抵制。而在这些人眼里，评论已属可有可无，一部新作推出后，组织一些一味吹捧的“评论”就足已了。现今的歌剧创作如火如荼，大有燎原之势，但掩饰不了其创作机制中仍然存在的种种问题。因此，即使是马后炮，该说的也还是要说吧。

今年是雅克·奥芬巴赫诞辰200周年。1819年的6月20日，奥芬巴赫出生在德国科隆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犹太教堂唱诗班歌手兼年度市集音乐家，后被任命为科隆犹太教堂的经文领读者，同时也是位音乐教师，会教授吉他和、长笛、小提琴、声乐等。奥芬巴赫是家中第七个孩子，顺理成章地被父亲要求与他的哥哥姐姐一样学音乐、学乐器。他最早的是小提琴，但后来喜欢上大提琴，于是转学大提琴，进步神速，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大提琴手，并与姐姐组成演奏小组，在当地社区和教堂演奏，小小年纪就积累了丰富的演奏经验。

奥芬巴赫14岁那年，老奥芬巴赫带前往家两个最有音乐天赋的孩子到巴黎去学琴，一位是奥芬巴赫，一位是他四岁的拉小提琴的哥哥。虽然进了巴黎音乐学院，但奥芬巴赫活动日子并不好过，他对学习课程不感兴趣（真正的大天才大都如此），法语更谈不上。奥芬巴赫是家中第七个孩子，顺理成章地被父亲要求与他的哥哥姐姐一样学音乐、学乐器。他最早的是小提琴，但后来喜欢上大提琴，于是转学大提琴，进步神速，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大提琴手，并与姐姐组成演奏小组，在当地社区和教堂演奏，小小年纪就积累了丰富的演奏经验。

从此，奥芬巴赫集作曲、指挥、导演、脚本编写、剧院经营管理等职务于一身，大展身手，源源不断地创作了许多轻歌剧。1855年，他真正的成名作《地狱中的奥尔菲斯》问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接着他又接连创作了“巴黎意大利剧院”）。

人类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天文科学亦然如此。今年4月10日21时，天文科学领域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人们用高倍望远镜发现了一颗远在5500万光年天体中的黑洞，人类历史上首次亲眼目睹了它，它浩淼深邃，深不可测，但人们终于观测到了它的神秘身影。世界各大媒体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并刊登了足以令人无比惊叹的图像，同时也证实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论断，引起了人们对天文物理学的巨大兴趣。想当年“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胸襟，现在看来委实渺小得产生共鸣。其实在音乐领域里早有作曲家对神秘莫测的宇宙感怀，创作了科幻天文音乐。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

的《行星组曲》即是一部科幻天文音乐作品。美国近代作曲家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中的一段柔绵委婉，融合着迷惘忧伤味韵的旋律，也同样有对渺渺空宇的穹隆发出宗教般的吟诵。正在世界各大媒体报道发现宇宙黑洞的巨大成就时，上海电视台艺术家频道播放了霍尔斯特

的《行星组曲》是他的代表作，创作于1914年至1916年，其中首曲《火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1914年8月前所作，曲中孕育着战争气氛和迹象。该组曲包括七首乐曲——火星、金星、木星、水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令人会意一笑的是，人类栖息的地球也是行星，却不在于其中，也许正如大诗人苏东坡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这部管弦乐组曲在科幻音乐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乐队编制庞大，启用了多种乐器，还运用了在演奏中极少出现的低音长笛、低音双簧管和低音单簧管，以及高音大号、低音小号等等。并且还有管风琴和众多的打击乐器，在最后的乐章中又加女声合唱（有时以两支长笛替代）。这些乐器的组合产生了丰富而迷离的音色彩。1920年10月15日，组曲由科兹指挥伦敦交响乐团首演。1922年10月27日伦敦交响乐团了第一张唱片。当然，这部作品跟天文学无关，仅仅附属于古代迦勒底人、埃及人、波斯人和中国人所熟悉的“占星术”之上的，或者说受了“占星术”的启示而创作的。在首演之前，霍尔斯特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这些乐曲只是暗示了诸行星名字的意义，不是标题音乐，与神话中同名占字的神祇毫无关系。如果要对乐曲欣赏作什么引导，不妨把这些乐曲的副标题作广义的运用。比如木星在普遍意义上是带来喜悦，在宗教庆典上，则是表现一种愉快的仪式；土星不只是肉体性的衰退，也包括有成就的幻想；而水星则是一种心灵中春天的意象。”

看到茫茫巨测的天体黑洞照片，听了天科幻音乐《行星组曲》，令人领悟到人类的艺术与科学的密不可分，犹如爱因斯坦既是科学家，又是小提琴家一样。再者，霍尔斯特

的《行星组曲》形式上非常独特。《霍夫曼的故事》全剧由五个场面构成，第一个与第五个场面是相同的，中间三个场面不同，因此通常将第一个场面作为序幕、第五个场面作为尾声，中间三个场面分为三幕。第一部歌剧讲述了诗人霍夫曼与三位女孩子的恋爱故事——最终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其与众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绝大部分的歌剧，都是围绕几个主要人物演绎一出故事，哪怕这个故事情节长达数年、数十年。《霍夫曼的故事》却是一个主人公的三个独立的故事，如果加上没有进一步展开的序幕与尾声中的女高音斯泰拉，那将是四个故事了。这种开放性的结构更加文学性，在以往的歌剧很少见到，具有开创性。又因为剧中的人物故事亦真亦幻，具有幻想性，因而此剧又被称为幻想歌剧。当然，总体上属于正歌剧的范畴。也就是说，写了一辈子轻歌剧的奥芬巴赫，却在最后一部作品一改“轻”为“正”，这在古今往来的作曲家

中，殊为罕见。正因为有这样的独特结构，尽管剧中人物众多，但在演出中，除了主人公霍夫曼之外由一位男高音饰演：四位女角色：斯泰拉、奥琳匹娅、安东妮娅、朱丽叶塔，往往会由一位女高音饰演；四位男角色：林多夫、科佩利乌斯、达培图托、米拉克尔，一般都由一

由于发现宇宙天体中神秘的黑洞并拍摄了照片，在人们心灵中形成巨大的冲击和遐想，从而使霍尔斯特

组曲中的火星，又称“战神”，快板，以弦乐、竖琴、定音鼓微弱的节奏作铺垫，低音管奏出暗淡幽远的第一主题，似乎是一种战争情绪的酝酿。紧接着呈现了某种战乱之中的激情，强烈的节奏在持续到类似炮火轰鸣的效果中结束。金星，又称“和平之神”，慢板，由三个抒情优美的主题旋律巧妙组合而成，其优雅，绅士般的风度与火星亢奋激昂的情绪形成强烈的对峙，洋溢着平和与自然之美，给人以宁静的涟漪荡漾之感而慢慢消散。水星，“飞翔之神”，很快的快板，回旋曲风格，又有谐谑曲的味道。钢琴和木管奏出幽默活泼的第一主题，然后独奏小提琴以同样的基调配奏出第二主题，二者在相互交汇的时空中进入尾声。木星，“欢乐之神”，仿如游戏般的快板，圆号在弦乐的快速伴奏下脱颖而出，呈现第二主题，然后第二主题顺流而下，又浮现具有民族舞风调的第二主题，此时充满与喜悦的情绪愈演愈烈，随即转化为犹如民间盛典般的第四主题，最终变为庄严的慢板，忽又慢变为主题结束。土星，“老年之神”，慢板，主题似乎透露出灰暗与忧虑思绪，一种步入老年的疑惑感心迹。低音提琴徐徐奏出老年衰弱的第一个主题，当第一主题慢慢融入铜管乐变奏后，长笛与竖琴摇曳着细小琶音，持续的风琴配合着回荡的钟声，渐渐带来安详而宁平的尾声；天王星，

“魔木之神”，行板，恐怖动机依然升起的前奏，低音管以和弦旋律画出舞曲风格的节奏，然后低音管奏出第一主题。此时，铜管乐的加入营造了趋于轻松洒脱的氛围，最后以管弦乐的手法烘托扑朔迷离的效果，慢慢进而逐渐远去。在最后的乐章中又加女声合唱（有时以两支长笛替代）。这些乐器的组合产生了丰富而迷离的音色彩。1920年10月15日，组曲由科兹指挥伦敦交响乐团首演。1922年10月27日伦敦交响乐团了第一张唱片。当然，这部作品跟天文学无关，仅仅附属于古代迦勒底人、埃及人、波斯人和中国人所熟悉的“占星术”之上的，或者说受了“占星术”的启示而创作的。在首演之前，霍尔斯特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这些乐曲只是暗示了诸行星名字的意义，不是标题音乐，与神话中同名占字的神祇毫无关系。如果要对乐曲欣赏作什么引导，不妨把这些乐曲的副标题作广义的运用。比如木星在普遍意义上是带来喜悦，在宗教庆典上，则是表现一种愉快的仪式；土星不只是肉体性的衰退，也包括有成就的幻想；而水星则是一种心灵中春天的意象。”

看到茫茫巨测的天体黑洞照片，听了天科幻音乐《行星组曲》，令人领悟到人类的艺术与科学的密不可分，犹如爱因斯坦既是科学家，又是小提琴家一样。再者，霍尔斯特

的《行星组曲》形式上非常独特。《霍夫曼的故事》全剧由五个场面构成，第一个与第五个场面是相同的，中间三个场面不同，因此通常将第一个场面作为序幕、第五个场面作为尾声，中间三个场面分为三幕。第一部歌剧讲述了诗人霍夫曼与三位女孩子的恋爱故事——最终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其与众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绝大部分的歌剧，都是围绕几个主要人物演绎一出故事，哪怕这个故事情节长达数年、数十年。《霍夫曼的故事》却是一个主人公的三个独立的故事，如果加上没有进一步展开的序幕与尾声中的女高音斯泰拉，那将是四个故事了。这种开放性的结构更加文学性，在以往的歌剧很少见到，具有开创性。又因为剧中的人物故事亦真亦幻，具有幻想性，因而此剧又被称为幻想歌剧。当然，总体上属于正歌剧的范畴。也就是说，写了一辈子轻歌剧的奥芬巴赫，却在最后一部作品一改“轻”为“正”，这在古今往来的作曲家

中，殊为罕见。正因为有这样的独特结构，尽管剧中人物众多，但在演出中，除了主人公霍夫曼之外由一位男高音饰演：四位女角色：斯泰拉、奥琳匹娅、安东妮娅、朱丽叶塔，往往会由一位女高音饰演；四位男角色：林多夫、科佩利乌斯、达培图托、米拉克尔，一般都由一

最后的奇光异彩

——奥芬巴赫与《霍夫曼的故事》

任海杰

《美丽的海伦》《蓝胡子》《巴黎生涯》《格罗什坦女公爵》《佩丽肖尔》《发瓦尔夫人》等名作，不仅在巴黎盛演不断，她还率领剧院到欧洲的一些著名城市巡演，如伦敦、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等，一时间风靡欧洲，连对